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初編 6

奸黨煽惑

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

蘇聖雄・著

軍方刊物對民主運動的報導

以《國魂》與《青年戰士報》為例

傅星福・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

初 編

第6冊

奸黨煽惑

——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

蘇 聖 雄 著

軍方刊物對民主運動的報導

——以《國魂》與《青年戰士報》為例

傅 星 福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 蘇聖雄 著
／軍方刊物對民主運動的報導——以《國魂》與《青年戰士報》為例 傅星福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3〔民102〕

序 4+ 目 2+122／序 2+ 目 2+102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初編：第 6 冊）

ISBN：978-986-322-259-0（精裝）

1. 二二八事件 2. 臺灣民主運動

733.08

102002943

ISBN-978-986-322-259-0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初 編 第 六 冊

ISBN：978-986-322-259-0

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

軍方刊物對民主運動的報導

——以《國魂》與《青年戰士報》為例

作 者 蘇聖雄／傅星福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初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6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作者簡介

蘇聖雄，生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任職於國史館。主要研究範圍為民國政治軍事史、蔣中正研究，著作舉要如〈論蔣中正對膠東之戰的處置（1932）〉、〈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之運用——以「行營」研究為例〉、〈轉危為安：武漢會戰期間蔣中正心態之考察〉、〈蔣中正與臺灣土地改革初探（1949-1956）〉、〈蔣中正與遷臺初期之立法院——以電力加價案為核心的討論〉。

提 要

二二八事件前後，蔣中正身處的時代背景是國共內戰愈益劇烈，國家金融紊亂，以及國民政府為日後行憲預先進行改組事宜。事變發生之後，軍政機關指出此為「奸黨」（共產黨）煽惑導致，遂成為蔣處理此事之基調。

何以在反對派兵的輿論之下，蔣中正仍執意派兵？受限於國民政府體制運作，在事件初期能令蔣聞知的反對派兵言論並不多，蔣實難以掌握事件初期的各種資訊。在大部分只能接受到「一面之詞」的情況下，蔣以為事件起於「奸黨煽惑」；為免情勢更加危急，乃做出派兵赴臺的決定。

現今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可以證明蔣中正暗中指使「屠殺」。對於國民黨中央通過的陳儀撤職案，蔣不予處理，應非為袒護陳儀，而是要他辦理善後事宜。而擢升彭孟緝及其他相關軍政人員，從蔣認定的「奸黨煽惑」暴亂脈絡看來，彭氏等鎮壓共黨有功，故爾如此。至於軍政人員屠殺臺民的訊息，多是以對「奸黨」的鎮壓行動呈現；針對臺灣無辜民眾被屠殺的直接信息，蔣知道的並不多。又其深為共黨製造假情報所困擾，乃視這些屠殺消息為共黨「宣傳威脅之慣技」，遂未予重視。

蔣當時面對的是整個中國紛亂的局勢，其當時依較可掌握的情報（陳儀、中統局等相關軍政人員提供之資訊），在有限時間內做出決策；此決策受歷史環境及蔣性格影響，深陷於國共內戰情勢之中。二二八事件，便在這種蔣中正難以突破的限制中發生。

出版序

認識聖雄已近九年。2002 年夏天，他以建國中學應屆畢業生通過甄試錄取為臺灣大學歷史系的新生，是時我正值修假研究不在國內，未參與系方舉辦的甄試歷程，故對他印象全無。2004 年 2 月他二年級的第二學期伊始，因上我所教授的「中國史四」必修課，才逐漸熟稔其形貌，但仍叫不出他的姓名。因該課程修課學生逾六十人，益以我汲汲於講課趕進度，未遑撥出時間一點名故爾。惟他從不曠課，且每坐前排，聽講專注，令我印象深刻。猶憶一次下課時，他至講台前問我 Nation 與 State 有何不同？約莫一年之後，我在臺大附近「醉紅」午餐時，他正好路過，見到玻璃窗中的我，還特意入內問我哪一本蔣中正的傳記最值得閱讀？其好學深思如此。

2006 年夏，聖雄以極其優異的學業成績畢業於臺大歷史系，在畢業之前即已考取本系之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是年冬天，他甫就讀碩士班不久，前來問我可否擔任其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自是我才知其姓名。經過初步詳談，聖雄擬以蔣中正之研究為其論文題旨，我亦尊重其志趣，其研究方向就此定調。接下來的兩年間，聖雄一面忙於修習所方規定的學分課程，準備學科考試，一面蒐閱有關書籍資料著手撰寫碩士論文。與聖雄商定的論文題目，本為「南昌行營之研究（1933～1935）」，該行營全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是蔣中正 1932 年 3 月出任委員長後所成立的第一個行營，這是個不錯的題目，尤其是相關的研究成果極少，值得去撰寫，可供發揮的空間亦大。但聖雄行有餘力，亦同時進行其他題目的撰寫，擬相機發表之，「蔣中正與二二八事件」即為其中之一。由於「蔣」文撰寫過程較為順利，已然成形，遂取代建構中的「南昌行營」為其學位論文。

與「南昌行營」相較，「二二八事件」在現今臺灣的政治敏感度遠超過之，何況又係以蔣中正對該事件的態度及處置為中心議題，更是敏感之極。對聖雄擬以此為學位論文題目，我雖難免有所躊躇瞻顧，但旋以學術應自外於政治，臺灣大學一向以傳承自由學風為標榜；再者，治史首在求真，只要本乎一心，根據第一手的檔案史料立論，應當無虞。2009年6月19日，聖雄以優秀的成績通過了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的口試，並於一個月後將依照口試委員們意見加以修訂的論文正式本繳交所方，取得碩士學位。同年8月，聖雄入營服預備軍官役，先在臺南縣之大內受基礎訓練，再赴高雄縣之陸軍步兵學校受分科教育，結訓後分發至桃園縣之中壢任少尉情報官，一年左右的軍旅生活，令他成長不少。2010年6月，聖雄在服役期滿前報考政治大學及臺灣大學的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均獲錄取，經選擇回母校就讀至今。

聖雄好學深思，勤奮用功，文筆簡鍊，分析能力亦強。最值得稱道的是他勤於撰述，自進入碩士班就讀以來六年間，已發表有八、九篇論文（另有書評一篇），這在現今臺灣的歷史研究生中是頗為少見的。如今其碩士論文正式本〈「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行將由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殊覺欣慰。聖雄論文的題目極具挑戰性，其內容主要是就蔣中正在二二八事件中之派兵問題及是否縱容屠殺問題加以探討論析，其優點為：其一、主題意識鮮明。直指二二八事件中最重要而最富爭議性的兩個核心問題，予以反覆論証，火力集中，切中其要，予人印象深刻。其二、引用資料頗稱豐富。且大多為可信度極高的檔案史料。尤其是曾參閱國史館所藏之《蔣中正總統檔案》，益以為數不少的專書、日記、資料集、論文等，使本論文的論證更具說服力。其三、思慮縝密，分析入理。其四、文筆流暢，用字簡扼。

綜觀其較重要的論點約為：其一、蔣中正因事件發生之初接到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的電報謂係「奸黨煽惑」所致（實則不然），奸黨即指共黨，使蔣誤以為事件性質係共黨叛亂，而對陳請求派兵赴臺鎮壓予以照准。其二、蔣在反對派兵的輿論下仍執意派兵，乃因居於中樞高位，所獲悉與事件相關的資訊甚為有限，且大多來自陳儀、情治單位等軍政人員「一面之詞」的報告，依此作出決定。其三、分析當時全國的大環境、國共戰爭烽火延燒大陸各地，國軍甫於山東萊蕪慘敗，益以金融紊亂，政府改組等，都令蔣難以專注臺灣事件，且以為事件與共黨有關，情勢嚴重，理應迅加鎮壓。其四、現

今缺乏任何直接證據證明蔣暗中指使屠殺，而臺灣軍政人員的鎮壓行爲，亦多以肅清「奸黨」呈現，蔣身爲國家最高領導人對此固難辭其咎，但不應將罪責完全推諸蔣。此外，關於事件中陳儀何時請兵的問題，學界原有三種說法，一說採信相關人士的回憶，認爲陳儀 1947 年 3 月 2 日請兵；另一說陳儀 3 月 4 日請兵；又一說指出蔣在決定派兵之前（3 月 5 日前），陳儀皆未請兵。聖雄深究陳儀呈蔣寅支電（3 月 4 日）內容之後，注意到發電用語中的細節，推論出陳儀的確以現今不存的寅冬電（3 月 2 日）請兵，亦即，陳儀確切請兵之時間點，該當爲 3 月 2 日。此說應足以釐清學界對此問題的分歧看法。

聖雄此作，就性質而言，乃一研究所碩士班的學位論文習作，根據檔案文獻等資料歸結出來的各論點，也不過是他個人粗略研習的結果，欠週延之處必不在少，持不同看法的人似應予包容與體諒，或就史學之道加以指正。誠如聖雄在其結論中云：「筆者並不認爲本論文所言絕對正確，道出了『真相』；也非欲指責學界先進，自以爲是；更不想涉入政治紛爭。只想試著對此嚴肅的課題，依自身的史學訓練，盡可能嚴謹地找出足以解釋歷史的說法。誠然，個人能力有限，文中必有盲點、錯誤，期待方家先進斧正」。斯言，足堪嘉許。

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暨名譽教授 胡 平 生

2012 年 12 月 1 日



目次

出版序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史料	5
第四節 章節架構	9
第二章 派兵問題	11
第一節 事件前蔣中正面臨的政治情勢	13
第二節 蔣掌握的事件初期資訊	17
第三節 蔣與反對派兵言論	30
第四節 派兵平變之確定	38
第五節 小 結	47
第三章 縱容屠殺？	53
第一節 事件期間蔣面臨的政治情勢	54
第二節 事件中期蔣所獲資訊及其因應	61
第三節 奸黨煽惑暴亂之確定	73
第四節 相關人員之黜陟	88
第五節 小 結	98
第四章 結 論	103
附錄 蔣中正獲知的二二八事件資訊簡表	107
徵引書目	11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二二八事件為 1947 年 2 月 28 日，在臺灣臺北因政府取締私烟引起的民變。目前已有多位研究者撰文探討事件發生之緣由，及誰該為此負責。關於責任問題，原應集矢於是時之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近年來一些學者轉為強調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中正之作用，認為他才是「幕後黑手」；陳儀若無蔣大力支持，不可能在臺灣釀起巨變，或膽敢派兵鎮壓、屠殺人民。相對地，另一派學者雖亦分析蔣在事件中的作用，卻較以同情理解的角度為蔣申說，肯定其措置。

蔣中正身為當時政府最高領導人，事件發生在其主政時期，追究政治責任本是天經地義的事。相關研究皆為專業歷史學家經過精密考證、分析之成果，必定掌握了一定的歷史事實，並建立了合理的歷史解釋。然而蔣氏究竟如一派研究者所言，是事變原凶，抑或如另一派學者描述，其舉措值得同情理解？令筆者十分感興趣，覺有繼續探究之價值。

關於蔣中正與二二八事件，隨著政府檔案、《蔣中正日記》之公開，已有數篇專文進行討論。然而，研究者或以事件為中心，「以事追人」來分析蔣在其中的作用，未從蔣之脈絡予以理解；或以「倒帶」的方式，將事件種種已知負面的結果，加諸蔣中正，指明其當負之責任；抑或從《蔣中正日記》下手，剖析蔣在其中的作用，而忽略國民政府體制運作對蔣氏之制約。

筆者以為，政府執政者應是總合各項信息，在大環境及個人限制之下，

做出認為合宜的決策；即執政者做出相關決定，當有其「理由」。筆者欲整合上述研究方法，以蔣中正為核心，探究他所置身的歷史背景、所能接收的資訊來源及信息內容，以之分析他的決策脈絡，了解其做出相關處置之「理由」，再從此評價蔣在整個二二八事件中措置之得失。本研究僅探討事件爆發後蔣中正之態度和處置，關於事件前的對臺設施及其他，不在本書論列範圍；日後筆者若有餘力，當再試行討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觸及蔣中正與二二八事件之文章不可謂不多，然直接相關的學術研究卻甚少。嚴格來說，對此課題撰有專文探討的學者，僅有李筱峰、陳儀深、楊天石。其他學者，或是將此課題視做二二八事件之分支而附帶提及，或是對國民政府決策做一整體討論，未將焦點集中於蔣。

一、李筱峰的研究

李筱峰之〈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兼論其責任問題〉，〔註1〕為研究蔣中正與二二八事件之首篇學術論文。是文寫作目的，在討論二二八事件中蔣的角色、對時局事態的認知，以及決斷造成的影響，進而討論蔣在事變中的「歷史責任」。第三章「事件中的不當處置」，和筆者研究最為相關，探討了蔣措置之紕繆。李氏論證軸心、問題意識非常明確，文筆流暢、深入淺出，惜未進一步深究蔣氏所以會做出這些舛訛處置之「理由」，筆者乃藉巨人之肩再做補充。

二、陳儀深的研究

陳儀深為研究蔣中正與二二八事件甚久亦相當深刻的學者。其最早談到此課題的論文為〈論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後半部份，〔註2〕在政府公布二二八檔案告一段落之後，發展為〈豈止是「維持治安」而已——論蔣介石

〔註1〕 李筱峰，〈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兼論其責任問題〉，收入張炎憲等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8），頁455～469。

〔註2〕 陳儀深，〈論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等，1992），頁27～75。

與台省軍政首長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置》，〔註3〕該文探討了蔣對事件之認知，及派兵決策擬定過程。其後，陳氏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中，以先前的研究為基礎，加上對1947年前後南京國民政府體制之分析，針對整個南京決策階層與二二八事件之責任，做了完整的議論。〔註4〕

陳儀深關於蔣中正與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資料掌握全面且論證十分遼密。然受限於論文寫作之出發點，是欲探究孰應為二二八事件負責，乃僅論述蔣之負面設施，其研究因此仍有可開展之處。

三、楊天石的研究

楊天石為海內外研究蔣中正的權威，其深入閱讀近年開放的《蔣中正日記》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部分，並參酌其他史料，撰成〈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蔣介石日記解讀〉一文。〔註5〕相較於李筱峰、陳儀深的研究，楊天石多了《蔣中正日記》之史料優勢。楊氏深刻了解二二八事件之複雜，乃提出事變雙重性、三駕馬車政治訴求等論點，令吾人對事件能有更深一層之認識，歷史本身乃非平面，而為立體之多維度交錯。楊氏並以多年對蔣中正研究累積之識見，對事件中蔣的態度做了深刻評析。然而，在檔案史料的掌握上，陳儀深似更勝一籌；一些關鍵問題，楊氏也未予闡述，很是可惜。如楊氏沒有論述蔣中正確切的派兵時間點，對於事件中蔣獲得的資訊，也僅粗略舉要，未深入辨析，而事件後相關人員之黜陟，楊氏亦付闕如。

四、其他相關研究

其他研究，或為研究蔣中正與二二八事件中的某一課題，或為論述國民政府在事件中的角色，未聚焦於蔣。這些研究，有吳文星擴充改寫自《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第三章「政府之因應與決策」的論文〈「二二八事件」期間國民政府的因應與決策之探討〉；〔註6〕有賴澤涵、馬若孟（Ramon H.

〔註3〕 陳儀深，〈豈止是「維持治安」而已——論蔣介石與台省軍政首長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置〉，《二二八事件新史料學術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3），頁144～161。

〔註4〕 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3章：南京決策階層的責任（此章由陳儀深執筆），頁95～169。

〔註5〕 楊天石，〈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蔣介石日記解讀〉，《傳記文學》第94卷第2期（2009，臺北），頁4～21。

〔註6〕 吳文星，〈「二二八事件」期間國民政府的因應與決策之探討〉，收入賴澤涵主

Myers)、魏萼合著的《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第五章「國民政府的應變」。^{〔註7〕}前述二項研究，時間較早，整理明晰，頗具開創性，惜一些關鍵檔案未予應用。戴國輝、葉芸芸合撰的《愛憎2·28——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一書第二篇第八章，^{〔註8〕}對中央派兵及軍隊登陸後臺灣的局勢，有所闡述，但未使用《蔣中正總統檔案》，在史料運用上遂有一大空白，有待補充。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第五章第二節「國民政府的決策考量」，^{〔註9〕}對蔣中正與二二八事件有所評述，見解超凡，然相較於針對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之精彩論說，其對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中正之討論，稍有落差。曾編有《二二八事件資料集》的鄧孔昭，^{〔註10〕}撰有〈從往來電文看「二二八事件」中的陳儀和蔣介石〉一文，^{〔註11〕}以蔣、陳往來電文演繹出頗有見地的五點看法，可加強本研究不足之處。傅玉能之〈「二二八」事件中國民政府派兵問題再探討〉一文，深入分析蔣當時所獲知的資訊，並對當時奉派援臺軍隊之調動狀況，予以考證，解決了一些關鍵問題，^{〔註12〕}然在檔案使用上，亦有罅漏。黃秀政〈論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及其對臺灣的傷害〉一文，^{〔註13〕}運用了新近出版的史料，將論述焦點集中於事件對臺灣造成的傷害，惜對中央之決策論述較少。黃彰健之《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史料充實，論證詳密，其卷二第八、九、十、十一篇及卷四第十八篇，^{〔註14〕}和本研究相關，筆者從中得到相當

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頁107～125。

〔註7〕 賴澤涵、馬若孟（Ramon H. Myers）、魏萼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英文版出版於1991年。

〔註8〕 戴國輝、葉芸芸，《愛憎2·28——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2）。

〔註9〕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

〔註10〕 鄧孔昭，《二二八事件資料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

〔註11〕 鄧孔昭，〈從電文往來看「二二八事件」中的陳儀和蔣介石〉，《台灣研究集刊》4期（2006，廈門），頁70～78。

〔註12〕 傅玉能，〈「二二八」事件中國民政府派兵問題再探討〉，《史學集刊》1期（2004，長春），頁43～50。

〔註13〕 黃秀政，〈論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及其對臺灣的傷害〉，《興大人文學報》36期（2006，臺中），頁493～540。

〔註14〕 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啓發。

關於此課題的非學術性文章，舉其要有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於2006年2月28日在《中央日報》發表的〈蔣中正處理228的基本立場與態度〉一文，以較為同情理解的立場，看蔣在事件中的決策；〔註15〕業餘史學研究者武之璋撰寫的《一甲子迷障：二二八真相解密》一書，〔註16〕則批駁「綠色學者」對蔣中正之惡意攻擊；中國時報主筆黃清龍，查閱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剛公開的《蔣中正日記》原件，撰成報導，〔註17〕首次對外披露蔣氏日記關於二二八事件之內容。這些著作，都有益於本研究之開展。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史料

本書之研究方法，從三方面下手：以檔案為主，分析蔣中正所獲知之資訊及措置；以蔣氏日記為輔，分析其對事件之心態；復配合其他回憶資料，找出蔣做出相關決策之理由，最後再試著對蔣在事件中的處置，做一評價。

筆者使用之資料，最重要者有三，即檔案資料、《蔣中正日記》，及回憶史料，茲分述如下。

一、檔案資料

本書主要使用庋藏於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蔣檔》）。此檔案原存於大溪頭寮賓館的「大溪檔案室」，外界乃多以《大溪檔案》稱之。大溪檔案室蒐羅並典藏蔣中正相關資料、檔案，將之整理分類，也為部分檔案撰寫重要事件始末。藉由《蔣檔》，吾人可得知蔣中正在二二八事件中獲得的資訊及所下的指令，十分重要。《蔣檔》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函電、手令等等，已編纂為文獻彙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戡亂時期·政治：二二八事件》，並出版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的《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註18〕

〔註15〕《中央日報》（臺北），2006年2月28日，第6版。

〔註16〕武之璋，《一甲子迷障：二二八真相解密》（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2007）。

〔註17〕《中國時報》（臺北），2008年7月21日，A6版。

〔註1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魏永竹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

過去二二八研究者已徵引之；然而，研究者沒有注意到《蔣中正總統檔案》不只《革命文獻》有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檔案，《特交檔案》、《特交文電》、《事略稿本》中都有相關材料。這批過去為研究者忽略的檔案，加上《革命文獻》，現已完整收入侯坤宏編輯之《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七）——大溪檔案》，〔註19〕對於解決一些關鍵問題，有莫大的助益。

其他與本研究相關的檔案，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之資料，現已出版，收入陳興唐主編的《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註20〕國史館庋藏的《國民政府檔案》，對本研究之開展亦甚具助益，今收入侯坤宏編輯之《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冊）》。〔註21〕

有謂官方資料或會刻意列作例行記錄，或為彰顯一代強人的道德性，歌功頌德而不真實，故僅僅利用官方資料研究二二八事件，在先天上充滿缺陷。〔註22〕此言甚是，然官方檔案區分多種，不可一概而論；史料價值，也因之有所不同。如政府公開之布告、電文，使用上便須謹慎小心；蔣中正在事件中與軍政人員往來的電報，可信度則相對較高。蓋此種電文若為日後宣傳做假，事件相關人員也沒法得知真實情況，除非先前有於電報中約定暗語，否則將陷入無法處理事變之窘境。是以筆者研究倚重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史料可信度應較無疑慮。〔註23〕

二、《蔣中正日記》

另一直接且重要的史料為《蔣中正日記》，原件藏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其中二二八事件前後之日記，已於2008年7月18日開放。2008年

省文獻委員會，1995修訂版）。

〔註19〕侯坤宏編輯，《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七）——大溪檔案》（臺北：國史館，2008）。

〔註20〕陳興唐主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

〔註21〕侯坤宏主編，《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冊）》（臺北：國史館，1997）。

〔註22〕陳儀深，〈論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等，1992），頁57、74。李敖亦對此有所論述，參見李敖，《李敖大全集》（臺北：成陽出版公司，1999），第27冊，另一面的二二八，頁129。

〔註23〕武之璋亦針對檔案史料之可信，提出五個原因，參見武之璋，《一甲子迷障：二二八真相解密》，頁161～164。

7月21日黃清龍在《中國時報》所撰的文章，已將二二八事件相關部分予以披露。楊天石在研讀蔣氏日記之後，參酌相關檔案，2009年2月在《傳記文學》發表〈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蔣介石日記解讀〉一文，亦徵引日記內容。筆者尚未能至胡佛研究所親閱《蔣中正日記》，蒙呂芳上教授提供部分日記內容，乃以之為主要引用來源，不足之處，則參酌黃、楊二氏徵引之蔣日記。又，《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係蔣氏秘書參閱相關函電令告，節抄蔣日記，仿《春秋》體例編撰而成。其摘抄者，與《蔣中正日記》原文無多大出入，〔註24〕可為筆者之徵引來源。秦孝儀等編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和《事略稿本》相類，為以蔣中正為核心的編年史書，〔註25〕其摘抄之蔣氏日記，亦為筆者所參用。〔註26〕

《蔣中正日記》所記是否真實，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本書論證之精確與否。楊天石對此議題謂：「日記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為寫給自己看的。此類日記，目的在於自用，而不在於示人傳世。其記事抒情，或為備忘，或為安排工作或生活，或為道德修養，或為總結人世經驗，或為宣洩感情，往往具有比較高的真實性。蔣的日記大體屬於此類。」〔註27〕可知《蔣中正日記》

〔註24〕如《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藏），1947年3月9日條，抄錄蔣中正是日日記之「上星期反省錄」謂：「臺灣暴亂事件，已擴延至全省各縣市，嚴重極矣。陳儀平日既以虛矯自飾為能，事發，又不及時採取有效措施，迨至禍已燎原，始行求援，可痛。」親見《蔣中正日記》的黃清龍則云3月8日蔣之日記「上星期反省錄」謂：「台灣暴動形勢已擴張至全台各城市，嚴重已極。公俠〔按，陳儀〕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黃清龍，〈老蔣228日記曝光 三批陳儀無能〉，《中國時報》，2008年7月21日。文句或有些許出入，然大意全然契合。至於時間差了一天，在此或為蔣中正習慣次日早上記前日日記，稿本編者乃將之列於次日條目。《事略稿本》摘引的蔣之日記尚有其他與原本日期不同之處，筆者推論此乃稿本編者為配合敘事脈絡，有意錯置。相關論述，散見正文腳註。

〔註25〕秦孝儀等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1978），卷六，下冊。

〔註26〕長年研究蔣中正並閱讀大量蔣之日記的楊天石，對《事略稿本》之引用蔣中正日記，提出幾點應當注意之處。楊氏云：「〔事略稿本〕對蔣的日記有刪選、有壓縮、有加工。特別應指出的是，編者為了維護蔣的形象，對日記手稿本中的部分內容有所諱飾；有些地方，編者還會根據後來的歷史環境對手稿本的文字做過刪改。」筆者當注意此點，相關分析，散論於正文腳註之中。

〔註27〕楊天石，〈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中國圖書評論》1期（2008，瀋陽），頁33～36。亦可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

應屬可靠，有甚高之史料價值，值得筆者徵引利用。

三、回憶史料

涉及事件的回憶資料甚多，然能與蔣中正有交集的屈指可數。筆者盡力蒐羅相關資料，縱與蔣無直接關聯，抑或可從中間接推論事理。舉其要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的《文史資料選輯》收錄之相關文章；〔註28〕周宏濤口述的《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註2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第一、二輯所收之事變相關人士回憶；〔註30〕李敖編輯出版《二二八研究》、《二二八研究續集》、《二二八研究三集》所收錄的回憶文章；〔註31〕張炎憲、李筱峰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之數篇文章；〔註32〕鄧孔昭編輯之《二二八事件資料集》收的回憶文章；〔註33〕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校《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之中的口述歷史訪談；〔註34〕趙毓麟之回憶文章〈中統我見我聞〉等等。〔註35〕上述資料選輯內容或有重複，復證其價值，不影響本書之引用。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尚有當時的報紙，〔註36〕其他史料，於此不一一列舉，

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前言：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頁VIII-XIX。

〔註28〕如何聘儒，〈蔣軍鎮壓臺灣人民起義紀實〉，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18輯，頁76～85。

〔註29〕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3）。

〔註30〕如柯遠芬，〈台灣二二八事變之真相〉，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註31〕李敖編著，《二二八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李敖編著，《二二八研究續集》（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李敖編著，《二二八研究三集》（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

〔註32〕張炎憲、李筱峰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89）。

〔註33〕鄧孔昭，《二二八事件資料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

〔註34〕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專案小組編校，《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修訂版）。魏永竹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修訂版）。魏永竹、李宣鋒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修訂版）。

〔註35〕趙毓麟，〈中統我見我聞〉，《中統內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註36〕如《大公報》（上海）、《中央日報》（南京）、《臺灣新生報》（臺北）等等。

將條列於文末之徵引書目中。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書擬對蔣中正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之態度及處置，做一整體探討。除去首章緒論及末章結論，主體為中間之兩章。

第一章「緒論」，述研究動機、文獻回顧、研究方法與史料，及本書的章節架構。

第二章處理「派兵問題」，核心議題是蔣中正因何做出派兵赴臺之決策？首先回顧此課題之相關研究；第一節敘述事件前蔣中正面臨的政治情勢，探明蔣決策之背景；第二節整理排比蔣事件初期所能獲知的資訊，探索其是時對事變之態度，申論其何以做出派兵赴臺的決策。當中將旁及陳儀事發後呈蔣電報的確切時間、柯遠芬謂蔣 2 月 28 日空投手諭之真偽、陳儀是否早在 3 月 2 日便請兵、蔣究竟何時派兵等問題；第三節筆者以國民政府體制運作之角度斟酌反對派兵的言論對蔣之影響，認為「蔣中正無法掌握事件中各種資訊」；第四節整理蔣決定派兵之後所獲知的資訊，分析他對這些信息之態度，指出此時的信息讓蔣堅定其派兵決策，節尾並重新解讀蔣 3 月 10 日對二二八事件之公開發言。

第三章題名：「縱容屠殺？」核心議題是蔣是否「縱容」甚或暗中「指使」對臺民的「屠殺」行動。起首對此課題之現有研究做一回溯；第一節整理蔣在事件期間面臨的政治情勢，探討當時環境對蔣的影響；第二節整理蔣在事件中期所獲資訊及相應措置，窮究蔣對事件性質之認知，指出蔣所認知的事變有「兩重性」；第三節探究白崇禧赴臺宣慰之後，蔣獲知的資訊，並分析這些信息讓蔣將事件定調為「奸黨煽惑」所引起，並試圖說明蔣應未縱容、指使軍政人員屠殺臺民；第四節則嘗試探討蔣緣何對事件相關人員未予嚴懲，反而大多於日後擢升。

第四章「結論」將以上兩章之論證做一總結，並附「蔣中正獲知的二二八事件資訊簡表」，以此深入剖析蔣是時獲知資訊的主要性質；提出蔣對事件之態度，是立基於認為「奸黨煽惑」導致臺變爆發——由此脈絡出發，吾人可以對蔣在事件中的一切措置，有貫串而不同以往的理解。